**牧歌：彭德怀上书为哪般？**

彭德怀上书，目的是什么，作用是什么，反对谁，拥护谁，由谁打倒，由谁保护，这一系列的问题，随着历史文献解密，给出了清晰答案。

1959年7月，江西庐山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彭德怀上书毛主席，称作万言书，那是一封三千五百字的信。信的前半部分，用国家计委统计数据，肯定了大跃进的显著成就，后半部分比较温和地讲述了存在的问题，主要是浮夸风，还有国民经济比例不协调。谈到存在的问题，彭德怀写道，那是全党违背毛主席指示造成的，责任全党有份，他彭德怀也有份，不过主要责任在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，比较激烈的一句话，是跃进派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，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。那时候，中央常委分一线二线，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周恩来为一线，毛主席在第二线，不管日常事务。这样的划分，缘自毛主席1953年底提议，集体通过，1956年八大实行，主要目的是吸取苏联斯大林教训，培养树造接班人，确保顺利交接班，也有毛主席身体因素，还有考虑国家大政方针也需要时间精力。毛主席退居第二线，成为重大事项决策人，党内纷争仲裁人。

彭德怀的信，符合庐山会议既定方向，符合毛主席纠左指导思想，支持毛主席纠左。该信也只是老生常谈，旧话重提，多数已是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内容。毛主席看了信说道，**“这人敢说话，容易得罪人。”**看得出来，毛主席为彭德怀的言论流露担忧。一封平常的信，毛主席称其为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》，经常委碰头议定，按照贯例，批转大会，作为纠左文件讨论。

庐山会议原定半个月，七月中旬结束，毛主席意欲开成神仙会，让大家心情舒畅，消除阴影，放下不快，既要结束左倾冒进，又要团结一致向前看，齐心协力搞建设。就在目的基本达到，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基本解决，行将散会的时候，彭德怀写了那封信。突如其来，横插一杠，不伦不类，先肯定大跃进，后否定大跃进，目的是什么？ 理论家康生也没弄明白。是的，确属横插一扛， 多此一举。会议已经按照毛主席所拟19个议题，讨论了七天，加上心情比较舒畅，与全者不仅对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善意批评，同时也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，广度深度，远远超过彭德怀的意见书。要知道，毛主席一直跟踪纠左，1958年以来， 召开了武昌会议、两次郑州会议、成都会议、上海会议，一连串的专题纠左会议， 还有其它会议穿插纠左，从来不见彭德怀上书，他却在全党纠左胜利在望的时候冒出来，显然别有所图。毛主席纠左并非举重若轻，而是比较艰难，特别是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，非常艰难。那次会议开了很长时间，没有一个人说真话，大会发言或讨论发言，按着上面的调子，一律念稿子，千人一面，万人一腔，滴水不漏，都是形势大好，绝无共产风浮夸风。那时候的毛主席，焦虑、孤独、无助！那时候的彭德怀，干什么去了？不需要写信，只要站出来说句话，举一个例子，封锁就突破了，会议就成功了，可是他没有，什么都没干，和全体参会人员一样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上下一致，严密封锁， 死扛到底。无奈之下，毛主席把会议规模扩展到村级干部，急招一批村干部入会，开成六级干部大会， 参会人员超万人。尽管这样，仍然不见成效，直到最后时刻，在总结讨论会上，河南省洛宁县上戈公社窑沟一营一连连长李成午，经地委书记纪登奎引导，鼓起勇气，说出了当地存在浮夸风共产风，这才打开了缺口。小人物说出实情，如同引爆炸弹，吓坏了洛宁县官员，遭到开会者围攻，他感受到杀头坐牢的压力， 想的了母亲和孩子将来怎么活下去，不敢说话也不想吃饭。毛主席得知破局消息，喜出望外， 马上接见了李成午，见面之际，紧握李成午的手，高度赞扬他：**“成午同志，你是一个实干家、政治家呀 ! ”** 见李成午激动紧张，让其坐下，随后聚精会神翻看李成午的发言记录，然后站起来，高兴地说：**“好，好，很好 ! 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，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。成午同志说得好啊 ! 看来，共产风是实，我们的会议算是开成功喽 ！”** 阅读过《毛主席接见放牛娃大批共产风》的人都知道这个情节。毛主席盼实话盼真话，可谓望眼欲穿，心急如焚，终于盼来了，那份开心、激动、高兴， 溢于言表。一个超万人的大型会议，全党高中低各级干部云集一处，竟然没有一个干部敢说真话，最后还是毛主席请来一个农民，才打破了僵局，突破了封锁。这里，真正感受到领袖的伟大，人民的伟大，只有领袖伟大，才有政党伟大，只有人民伟大，领袖才有信心！有人说彭德怀敢于仗义直言为民请命，请问，那时候， 为什么不敢说一句，怎么不请命，怎么不写信？徒有虚名罢了！毛主席日理万机，日夜操劳，不懈努力，经过前期数次纠左，历时八个多月，好不容易在庐山达成全党共识，纠左基本成功，朱德也高兴了，看到希望了，事情都翻篇了，事情成历史了，大家都轻装上阵，一齐向前看了，彭德怀却在与会者快要下山的当口写信上书，这样画蛇添足事后诸葛的举动，这样翻旧帐老帐秋后算帐的行为，意味着什么？真是为民请命吗？ 答案是否定的！！

彭德怀上到庐山的表现，学者新伟老师画了一幅像：“一身戾气上庐山，七天七骂意尤未尽再上书”，说他上山就是为出气，使人觉得意外。意外之一，人称为民请命的彭德怀，不愿参加旨在纠左的庐山会议。彭德怀真是为民请命，接到会议通知，应该积极高兴，实际却相反，他不想上山，不想参会，动员老部下时任总参谋长黄克诚代其上山开会，在黄克诚推辞劝说之下，才“一身戾气上庐山。”上山之后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看谁都不顺眼，说什么都来气，会上会下都骂娘，逮着谁骂谁，任何人都敢骂，一脸骄横，一脸玩世不恭，好像全中国人都欠他二斗米，连饭桌上也骂人，搞得大家没法吃饭。七天讨论会，在西北组骂了七次，把大跃进和一线领导人骂得一无是处，随心所欲，恶意攻击，吓得秘书们两手发抖， 不敢作记录。会上骂了七次不解气，会下还要面谈，还要写信，决意要把事情搞大。意外之二，彭德怀没有做调查。彭德怀如果真要为民请命，就应如抬举他的人所言，深入基层，走村串户，调查研究，写出调查报告，揭露浮夸风共产风危害， 为庐山会议纠左做准备。彭德怀也可以学习毛主席，委派自己的秘书种实验田。毛主席派秘书戚本禹田家英到四川种试验田，掌握一手资料科学数据拿到庐山作证据，批判浮夸风。实际也相反，彭德怀什么也没干，既没有亲自调查，也没有派人调查，连意见信也是临时动念所写，是在七天七骂之后，没达个人目的，心中不平，清算派的其他人建议去找毛主席面谈，又因为去的时候与毛主席作息时间不对路，面谈没成，清算派同僚又转而建议写信。所谓万言书，请命书，就是在戾气未消的情况下，急急忙忙赶写而成，压根谈不上为民请名。信里内容，多是套话，官话，老话，陈话，没有一个事例，没有一句民话，还有否定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成份。新伟老师介绍，意见信，由张闻天指导所写，彭德怀没那个水平，只是当了清算派的代言人！。张闻天，早年追随王明左倾路线，批判过毛主席的正确路线，还要开除毛主席的党籍，跟刘少奇是冤家，长期对立，这是毛主席讲的。在长征路上负过总责，遵义会议有功。延安召开的七大会议，由于刘少奇等人反对王明路线的人当中央委员，毛主席作为会议主持人，力排众议，还是将王明等人选入中央委员，张闻天还进了政治局。1956年， 一线领导人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八大会议， 将张闻天排除政治局。张闻天，建国后先任苏联大使， 后任外交部副部长，特别是在外交部长陈毅手下任这个副部长，倍感受压抑，深感不得志，一身怨气上庐山，怨气碰戾气，很是投缘，彭张庐山便唱合。

彭德怀的气，跟张闻天有所不同，主要源自不满足，由怨而生恨。他的战功，除了毛主席，没人压头了，在将帅里面，能和林彪相提并论了，这一点世人都不否认。不过他缺乏自知之名，忘了自己从哪里来，忘了自己和其他将帅一样，靠毛主席树造金身，摆出一副骄横架式，认为打败美国，老子天下第一了，不可一世了！彭德怀忘却了根本，忘却了从井岗山到抗美援朝，次次都离不开毛主席，只要脱离毛主席正确指挥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当年在八路军指挥部，违反中央作战原则，搞了一个百团大战方案，上报待批， 中央尚未批准，他就擅自开打，将八路军全部家底拖进战役，结果是，作战两千一百多次，八路军阵亡两万多人，伤残一万多人，根据地缩小一半，根据地人口，从一个亿锐减到五千万人，把长征后积蓄的革命力量，血拼一半，造成重大危机。彭德怀目无中央目无纪律，一个败军之将。那时候，毛主席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，一直没有批准那个方案。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，八路军，既要打击侵华日军，还要提防蒋介石和地方军阀，故打击日军的作战原则，不能打阵地战，不能拼家底，不能拼消耗， 只能应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打游击战，打麻雀战，打持久战。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，边打边补救，八路军才走出重围，脱离险境，得以恢复，发展壮大。抗美援朝，彭德怀自以为是，又一次不听毛主席的话，再次失败，志愿军司令部被炸，牺牲了毛岸英，自己也差点牺牲了。他还忘记了毛主席时代人民的精神，忘记了毛主席为军队铸造的灵魂，离开英雄的人民和英雄的军队，他同样一事无成。一个毛岸英，能抵百万兵，领袖作表率，官兵齐效命，彭德怀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抗美援朝，毛主席选人挂帅，总在元帅里面选，其实，随便点个军长任司令，照样打败美军，谁去都一样，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指挥命令，而且只要执行毛主席的命令，就一定打胜仗。如果历史能够穿越，让彭德怀接受蒋介石指挥，带领国民党的军队去打美国，结果不用讨论，历史早已给出答案，绝对是败军之将！

彭德怀的苦劳功劳，党和人民是肯定的，早在1952年，抗美援朝还没结束，就回国担当重任，国防部长，军委副主席，主持军委工作，还是政治局委员， 国务院副总理，党政军都是要职，地位够显赫，实权够大，应该满足了！当那个不敢出战朝鲜又比他年轻的林彪进入中央常委，成为二梯队接班人，就不淡定了，特别是，政敌刘少奇，在庐山会议前不久的1959年4月，接任了毛主席主动让出的国家主席，更加不平衡，感到怀才不遇，没被重用，“我老了，毛主席不用我了”，是他挂在嘴边的牢骚话，还以辞职的方式以退为进，公然伸手，要官要权。上海会议期间，毛主席批评他：“**难道国防部长，副总理，还不满足？”**毛主席还曾经对彭德怀说：“**我们两人签个协议，我死以后，你不要造反。”**可见彭德怀有多霸道，有多邪乎。彭德怀自我澎胀了，脑袋发烧了，他要当国家主席，在苏联赫鲁晓夫策反下， 发展到秘密组织军事俱乐部，意欲搞政变。有关军事俱乐部一事，戚本禹回忆录有详细记述， 毛选七卷里也有提及，刘少奇在庐山会上反击彭德怀刀刀见血，也能说明一些问题**。**刘少奇说“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（三国时的魏延脑后有反骨，被诸葛亮所杀），朱可夫的党性（前苏联赫鲁晓夫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搞宫廷政变），冯玉祥的作风（即伪君子），与其你篡党，还不如我篡党。”后來1962年，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纠左大会上，刘少奇还說：“別的人都可以平反，就是彭德怀不能平反，因为彭德怀里通外国。”尽管刘少奇打击政敌的话难免偏激和失真，特别是那一句“与其你篡党，还不如我篡党”近似反动，然而，作为刚刚上任的国家主席，总不致于空穴来风胡乱讲话，所以，刘少奇的话，从反面映证了彭德怀的野心和阴谋。就在庐山会议期间，苏修叛徒集团活跃起来，赫鲁晓夫在美国发表演说，声援彭德怀。同期，留守中南海值班的陈毅，接到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策反电话，他当即上山报告毛主席。曾经，周恩来与贺龙率领代表团出席苏联会议，也遭遇苏修策反，周贺立即结束参会，秘密离苏回国，向中央报告。同样的事情，彭德怀被策反，回国却不报告。还有一件可疑之事。中苏交恶从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开始，原因是苏联要求在大连建立军港，并建设适应水上水下通信联络的长波电台，被毛主席顶了回去。这件事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，大事大非，作为国防部长，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，理应毫不含糊地表明立场，维护国家民族利，想不到，彭德怀不表态，不说上下，不置可否，岂不奇怪？可见，刘少奇讲彭德怀理通外国，确有根据。回看庐山彭德怀，那样骄横，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，甚至敢于冲撞毛主席，与赫鲁晓夫撑腰壮胆，不能说没有关联。

彭德怀、刘少奇互为对手的历史根源，是在高饶事件上结了仇，他们表面和颜悦色，你好我好，暗中都想致对方于死地。一个是国防部长，主持军委工作，手握兵权，一个是接班人，又是国家主席，你恨我，我也恨你，你怕我，我也怕你，都在寻找机会搞跨对方。庐山会议，彭德怀七天七骂，开足火力进攻，矛头主要对着刘少奇，尽管使尽全身解数，效果并不好，眼看就要散会，刘少奇为代表的跃进派没人被撤职，没人受处分，全都安然无事，很是不服气，于是去找毛主席面谈，面谈不成改为写信，希望借到主席的东风，从组织上清算刘少奇邓小平等跃进派，搬倒刘少奇。这就是写信的真实目的。彭德怀把信送出之后，还跟张闻天等人分析猜测毛主席如何处理，希望毛主席把意见信批转大会，得到与会人员广泛赞同，幻想自己的威望大升。

彭德怀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结果惹翻了一大片，让刘少奇捉住尾巴， 被扣上反毛反共反党集团的帽子，差点进入大牢，在毛主席干预之下，才保下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。毛主席向大会批转彭德怀的信，作为纠左文件让大会讨论，原本没当多大的事。一个平平常常的意见书，跃进派原本也不以为然，没拿它当回事，周恩来也说那封信没什么特别。然而，彭德怀为代表的清算派，却以毛主席批转信件为上方宝剑，高高举着它，向刘少奇为代表的跃进派发起攻击，张闻天、黄克诚、胡南省委书记邹小舟等人，都在大会上发言，声援彭德怀，批判刘少。特别是张闻天，号称党内理论家， 在大会上发言3个多小时，直面攻击跃进派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，攻击的矛头，指向刘少奇等跃进派，并逐渐转移到毛主席，发泄私愤，发泄不满。清算派的进攻，让跃进派坐不住了，忍不下了，以刘少奇为代表，柯庆施、王任重、陶铸、李井泉等一批地方大员，抓住信中的把柄，坚决反击，双方严重对立，互不相让，把个庐山斗得乌烟瘴气，把个意见信也斗出了名。

毛主席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仲裁人，面对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，只能调解矛盾，舒缓情绪，两面劝和，稳定大局，没有动用组织程序的迹象。因此，毛主席在7月23日的大会上，讲了两个小时，用不点名的方式，用劝导代批评的方法， 讲道理摆事实，和风细雨，两面安抚，意在说服休战，讲到激动处，甚至不惜自己背锅顶错，希望换取两方冷静清醒，希望两方握手唱和。首先劝导刘少奇，接着劝导彭德怀，然后再劝导刘少奇，接着再劝导彭德怀，循环往复两个小时，各劝十多个回合，看不出劝谁多劝谁少。平衡平衡再平衡，是毛主席讲话的初衷，是毛主席处理庐山问题的指导思想。就是这样，彭德怀还是不依不饶，恕气不消，几次拒绝毛主席主动与他勾通的机会，对朱德、周恩来的批评也听不进了，全然一副恕目金刚，完全走向对抗！跃进派同样不依不饶，势不两立，会上打不倒清算派，转头向毛主席施压，实际就是逼宫，强烈要求处理彭德怀。

毛主席主持的庐山会议，接力纠左，持续纠左，在此前历经八个多月召开数次会议基础上，基本上攻克了顽疾，统一了全党认识，纠左成效明显，扭转了方向，但是，成效还是不够稳定，遇到风波就回潮。大跃进中的刘少奇等人，一方面努力工作，一方面又大搞浮夸，究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军功，在战功赫赫为数众多的老帅老将面前，说不起话，硬不起腰，在那个讲功劳，讲贡献，讲成绩，讲本事的年代，要保住接班人地位，就得搞政绩工程，立功劳，树形象，赢掌声。想干事情，想出成绩，是本意，而且也出了成绩，连彭德怀的信里也不否认，只是方法不对，急攻近利，急于求成，还有官僚主义作风，这就是毛主席当年一面批刘一面保刘的原因，惩前毖向，治病救人，也是毛主席一贯主张的干部政策。毛主席接手的新中国，除了政党、政权、政府和军队是新的，其它都是旧的，都是烂的，一幅烂摊子，一穷二白，一无所有，全国人民已经穷久了，穷怕了，穷急了，满心希望共产党带领人民大干快上，快速摆脱积弱积贫， 过上好日子。因此，大跃进完全正确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完全正确，只有大跃进，才能大飞跃！在这种背景下，保护热情，维护团结，继续大干，样样都重要。百废待兴的新中国，需要干部，需要人才，需要人搞事情。而且，在探索的路上，必然出错，应该允许犯错误，允许改正错误。我们知道的共产风，现在看来，主要来自于对新事物认知程度的限制。人民公社，诞生于1958年，把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在一起，是社会主义的一粒种子，它怎样生根发芽，怎样开花结果，谁也没见过。它的规模多大合适，它的核算怎样分级，都必须经过实践总结，才能提高完善，才能有条不紊。人民公社的规模，它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体制，在1959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才确定下来，或者说从那时候开始，才全面执行毛主席的指示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一个统一蓝本，公社规模，有的大到一个县，以县为单位统一核算，小的公社，规模为几个大队，跟现在几个村的幅员面积差不多，也以公社为核算单位，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进行核算，实行平均分配，必然出现一平二调，不要等价交换，自然遭到反对，自然形成共产风。那个时候，不仅没有来得及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，而且也没有来得及确立允许有差别的分配制度，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，一时半会闹不明白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概念也还没理清，全国全面处在探索之中，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，加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大跃进，千头万绪，矛盾交错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神仙也不能避免。把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问题全部批成主观意愿，归究某一人或某些人，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不客观不公正， 也不讲良心。郑州二次会议上，毛主席对纪登奎说：“**人民公社不是办糟了，而是办早了！”**毛主席的话，表述了两层意思，一方面，超越了人民群众的认识，理论方面跟不上，另一方面，应该先搞试点， 待取得经验之后逐渐展开。毛主席对出现的问题，判断是准确的，处理也是公正的，他总是希望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正确的道路上，为全国人民多做事，为国家建设多出力，为党的事业多立功， 因此，那个时候，维护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，保护建设热情，保持全党全国干部稳定，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刘少奇比较顽固，他的主要错误不是犯了错误，而是坚持错误，主观武断，盲目自信，没有胸怀，不接受他人意见，不具有民主作风。他的错误作法，受到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批评，也受到国内外舆论强大压力，有失威信，面子难看，在庐山会议上强压怒火， 隐忍不发。彭德怀的意见信，清算派的刻意进攻，算是撞到刘少奇枪口上了， 撞了个正着，送上门找打，也惹翻了搞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们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某些大员，同时，彭德怀无情批斗粟裕和刘伯承，早就引起一些老帅老将强烈不满，早就看不惯，只是没有人领头，群龙无首，庐山会上，跟着刘少奇等跃进派，趁机围攻彭德怀，另外庐山会议上，他玩世不恭到处骂娘的作派， 还有那个严重的军事俱乐部问题，来了个总暴发。彭德怀的火力虽然猛烈，但是没有刘少奇的火力强大，注定要失败。

历史上的庐山会议，由于刘少奇等人坚持，并认定彭德怀代表国内外右派势力向党进攻，两方严重对抗，失去了调解意义，没有了劝和希望，毛主席只能果断裁决，结束纷争，维护大局。当时的跃进派，承载着国家重担，只有工作方法问题，没有犯错故意，更无卖国投敌之嫌，前期正在接受批评改正错误，会后还要继续为党工作。权衡之下，毛主席同意了刘少奇等人的要求。于是，政治局扩大会议开成了中央全会，会期延长了半个月，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对彭德怀的处理决定，并于8月17日，向全党发出了反右倾思想的指示。

纠左变成反右，历史的又一痛点。彭德怀，必须要为这段历史承担部分责任，因为他的横打炮，因为他的私欲，把一个好端端的纠左会议，演变成反右会议，浮夸风共产风在一些地方故态萌发，少数地区还变本加利，更加猛烈，扩大了损失，进一步损坏了党的形象，震惊全国的河南信阳事件，就在第二波浮夸风里催生了，共产风浮夸风又延续了两年多，在这两年多时间里， 毛主席再次投入了大量精力纠左。好在庐山会议前，经过毛主席连续多次会议纠正，特别是冲破北京封锁，通过《党内通信》发至六经干部的公开信，一直发到生产小队长，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毛主席的指示，听到了党中央的真实声音，绝大多数人觉悟了、清醒了，自觉抵制左倾歪风，才使得第二波共产风浮夸风被局限在少数区域，不至于全面泛滥。为了全面制止共产风浮夸风，彻底纠正左倾错误，让经济建设全面驰向健康轨道，毛主席在1961年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之风的号召，在此基础上，于1962年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的出气大会通气大会，左倾冒进形势才根本好转。根治了浮夸风共产风，信阳人民说：**“毛主席第二次解放了信阳人民！”**想想，其它地方的人民， 其感受，与信阳人民不差多远。

明明白白了，清清楚楚了，彭德怀庐山上书，不是什么为民请命，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，他来当国家主席。这是彭德怀自己说的话，戚本禹回忆录里有记述。事隔多年后的文革期间，应首都红卫兵组织的要求， 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和亲自掌控，派首都红卫兵王大宾等人，前往四川把彭德怀接回北京接受群众批判。彭德怀与王大宾等人关系搞得不错，回京一路融洽，彭德怀对王大宾等人說，**“你们現在才反刘少奇，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刘少奇了。你们說我反毛主席，我不是。我是反刘少奇。”**王大宾等人向中央文革报告了彭德怀的话，还质疑当年彭德怀的案子是否正确。

迷雾开，浮云散，天空依旧蓝！**彭德怀被刘少奇打倒，也被自己打倒！彭德怀上书，不是反毛主席，而是反刘少奇，不是为民请命，而是为已谋私！**

**中国人民要记住，当年为民请命者，主要是毛主席，还有朱老总！**

**牧歌 2021年5月20日**

*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*